

伊拉克国家建构中的部落问题： 历史嬗变、结构张力与治理调适

李 甜

摘 要：伊拉克的国家建构自其建国以来便充满波折，部落作为伊拉克社会的基石，始终贯穿其中并深刻影响这一进程。历史上，伊拉克部落与国家间关系在英国殖民统治、卡塞姆和阿里夫兄弟执政、复兴党执政、后萨达姆时期等不同阶段呈现出复杂的互动图景。部落始终在国家建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这一进程中也伴随着部落权力与国家权力的拉锯博弈、部落习惯法与国家法律体系的规范冲突、部落武装与国家军队的周期性对抗、部落认同对国家认同的撕裂排斥等张力矛盾。对此，伊拉克政府曾试图采取多种策略来解决部落问题，如将部落机制适度纳入伊拉克国家治理体系，借现代化进程来削弱部落的经济社会基础，以“仪式—记忆—符号”来培育部落民的国家认同等。尽管这些策略尝试并未彻底解决部落与国家间的结构性矛盾，但在实践中却为伊拉克未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积累了本土化经验，更为中东地区国家在处理传统部落与国家建构的关系方面提供了镜鉴。

关 键 词：伊拉克；国家建构；部落；国家认同

作者简介：李甜，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3 级博士研究生（天津 300350）。

文章编号：1673-5161(2026)01-0129-26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国家建构是“由国家统治阶级依托国家政权力量来主导实施的一系列相互促发、彼此联系的国家政治制度体系现代化过程”^①。国家建构既涵盖国家政治结构、制度体系、法律规范的建立完善,又包括行政资源的整合和集中,同时还需要通过国家权力对价值观、象征符号、记忆等内容进行创造、证实、培育、选择、确定、保存和灌输。^② 据此,伊拉克国家建构依然漫长。伊拉克作为国家的主体身份,是英国凭借强硬手段,将巴士拉、巴格达、摩苏尔强行划归到伊拉克版图的人为产物。^③ 自此,伊拉克国家建构艰难起步,甚至至今仍笼罩在动荡阴影中。究其根本,伊拉克作为国家身份的同时,也是一个部落社会。部落作为早于国家产生的存在,不仅未随着国家建立而消失,反而成为伊拉克社会最坚韧的组织形态,与国家建构不同阶段的中央政权形成了紧密互动。因此,要理解伊拉克国家建构的未竟之路,部落问题既是无法绕开的起点,也是破解困局的关键。

关于伊拉克部落和国家建构,国外现有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一是伊拉克部落组织结构与历史发展研究。萨姆·斯托尔佐夫(Sam G. Stolzoff)通过建立“伊拉克阿拉伯部落矩阵”(The Iraqi Arab Tribal Matrix, TIATM)、“库尔德部落矩阵”(The Iraqi Kurdish Tribal Matrix, TIKTM)、“统一的阿拉伯和库尔德子部落指数”(Consolidated Iraqi Arab and Kurdish Sub Tribal Index, CIAKSI)三种数据库,研究伊拉克部落系统。^④ 弗雷德·唐纳(Fred McGraw Donner)剖析了阿拉伯帝国征服伊拉克时期阿拉伯部落在伊拉克的发展状况。^⑤ 二是国家建构中伊拉克的部落政策研究。阿玛兹·巴拉姆(Amatzia Baram)阐述了萨达姆执政中后期,伊拉克试图以部落主义来表达政治诉求。^⑥ 三是伊拉克部落对国家建构的影响研究。法利赫·贾巴尔(Faleh A. Jabar)和胡沙姆·达伍德(Hosham

① 于春洋:《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理论、历史与现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87 页。

② 王建娥:《族际政治:20 世纪的理论与实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9-61 页。

③ Noga Efrati, “Postage Stamp Iconography in Post-Saddam Iraq: Sect-specific Symbols or Nationalist Imagery?,”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 24, No. 4, 2018, pp. 958-976.

④ Sam G. Stolzoff, *The Iraqi Tribal System*, Minneapolis: Two Harbors Press, 2009.

⑤ Fred McGraw Donner, *The Arab Tribes in the Muslim Conquest of Iraq*, Ph.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75.

⑥ Amatzia Baram, “Neo-Tribalism in Iraq: Saddam Hussein’s Tribal Policies 1991-9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29, No. 1, 1997, pp. 1-31.

Dawod)探讨了伊拉克部落与国家政权演变、殖民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的关系。^①海安·杜汗(Haian Dukhan)探讨了伊拉克部落武装在帮助国家平息内部骚乱、打击外部威胁、捍卫领导人权力等方面发挥的显著作用,但随着部落势力的增强,部落正从国家那里获得更多让步。^②总的来看,国外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也存在局限:一是对部落与国家间关系探讨集中于复兴党执政和后萨达姆时期,缺少全局的整体梳理;二是存在西方中心主义叙事偏差。

与国外学界相比,国内学者对伊拉克国家建构中部落问题的相关研究尚不充分。一是现有研究在使用西方二手文献的同时,未积极拓展伊拉克本土访谈和田野调查资料以及非西方文献的整合运用;二是对伊拉克部落问题研究较少。国内学者主要关注伊拉克国家建构的历史特点、政党政治与政治认同、伊库尔德问题、美国对伊政策等议题^③,部落问题散见于对相关议题的探讨中,但并不集中。就伊拉克部落主题而言,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伊拉克阿拉伯部落问题起源的历史考察、美军与安巴尔部落在打击“伊拉克伊斯兰国”中发展出的代理关系、伊拉克战后部落的外在政治研究等。^④总的来看,将部落问题置于伊拉克国家建构中的整体考察尚有较大探索空间。鉴于此,本文聚焦政党、族群教派等传统分析路径之外,尝试以部落与国家互动关系为视角,并在整合运用相关文献基础上,对伊拉克国家建构中的部落问题进行系统探析。

① Faleh Abdul-Jabar and Hosham Dawod, eds., *Tribes and Power: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Saqi Books, 2003.

② Haian Dukhan, “Tribal Mobilisation Forces in Iraq: Subtleties of Formation and Consequential Power Dynamics,”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50, No. 5, 2023, pp. 1337–1351.

③ 黄民兴:《伊拉克民族构建问题的根源及其影响》,载《西亚非洲》2003年第6期;黄民兴、史永强:《试析后萨达姆时代伊拉克民族国家构建的主要特点》,载《西亚非洲》2023年第5期;韩志斌、薛亦凡:《伊拉克复兴党的兴衰成败与现实影响》,载《西亚非洲》2021年第3期;韩志斌:《民族主义建构中的政治认同——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政治实践个案考察》,载《世界民族》2006年第1期;李睿恒:《国家建构视域下伊拉克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演变》,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1期;冯焱:《伊战后美国对伊拉克库尔德政策的动因及走向》,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1年第2期。

④ 梁娟娟:《伊拉克阿拉伯部落问题起源的历史考察》,载《中东研究》2023年第1期;文少彪:《利益、信息与偏好:美军与安巴尔部落镇压叛乱的代理人战争》,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1年第1期;刘东宁、马立蓉:《弱国家、强部落:伊拉克战争后部落外在政治研究》,载《阿拉伯研究论丛》2024年第1期。

一、生成情景：伊拉克社会的部落概况

部落是中东地区最具辨识度的文化标识与社会根基。长期以来,伊拉克社会呈现出独特而又复杂的部落概况。这些以血缘为纽带、以传统为根基的部落组织,不仅是伊拉克历史文明的活态传承者,而且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关键变量。

(一) 伊拉克部落分布呈现地理环境与族群宗教相互交织的空间格局

伊拉克大约有 150 个部落,由大约 2,000 个不同规模的宗族构成。最大的部落人口超 100 万人,最小的仅有几千人。^① 在伊拉克,至少四分之三的伊拉克人是部落成员或有部落血缘关系。^② 从整体看,伊拉克部落分布具有两大特征:一是具有较强地域适应性。历史上,贝都因部落陆续从阿拉伯半岛向北迁徙至伊拉克,是基于地理环境与生存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前,河流灌溉区是部落聚居的核心,而西部荒漠地带的部落以游牧或半游牧为主,部落数量少于南部平原地区。二是族群教派与地域分布绑定。伊拉克分布有阿拉伯、库尔德、土库曼、雅兹迪等部落。阿拉伯人,作为伊主体民族,占总人口 75%~80%,覆盖从巴士拉到摩苏尔的平原地区。^③ 什叶派阿拉伯部落集中分布于南部沼泽地区被称为“沼泽阿拉伯人”,过着半农半牧生活^④。逊尼派阿拉伯部落分布在“逊尼派三角地带”^⑤,包括提克里特(Tikrit)、杜莱姆(Dulaim)等部落。其中,杜莱姆是最大的逊尼派阿拉伯部落联盟。库尔德人是伊第二大民族,占总人口 15%~20%,多居住在东北部山区,以游牧为生,靠近平原的地区库尔德人已逐渐定居务农。^⑥ 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以下简称“伊库区”)分布着巴尔扎尼、泽巴里、苏尔齐斯等诸多部落,其中以巴尔赞地区的巴尔扎尼部落影响最大。

① Hussein D. Hassan, *Iraq: Tribal Structure, Social, and Political Activitie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Order Code RS22626, April 7, 2008, p. 1.

② Neil MacFarquhar, “Unpredictable Force Awaits U. S. in Iraq Storied Tribes of the Middle East Devout, Armed and Nationalistic,”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anuary 7, 2003, p. 2.

③ David E. Long, Bernard Reich and Mark Gasiorowski,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07, p. 131.

④ 黄民兴:《中东国家通史:伊拉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第 3 页。

⑤ “逊尼派三角地带”主要位于伊拉克巴格达西北部、安巴尔省会拉马迪东北部及提克里特南部地区间的三角地带,人口较稠密,主要分布着逊尼派阿拉伯部落。该区域曾是萨达姆政权的核心支持区。美军入侵伊拉克后,该区域成为反美武装活动中心。

⑥ David E. Long, Bernard Reich and Mark Gasiorowski,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p. 131.

（二）伊拉克部落结构成为嵌入伊拉克社会的基础组织骨架

部落是伊拉克社会的基础组织结构。阿拉伯人占伊总人口多数,一个完整的阿拉伯部落组织结构涉及大家庭(*khams*)、家族(*biet*)、氏族(*fakhdh*)、部落(‘*ashira*)、部落联盟(*qabila*)五个层级^①,其中,前三个偏经济和家庭,后两个偏政治和军事^②。大家庭是最基本单位,一旦大家庭结构破裂,部落社会就不复存在。崇尚男性地位的部落传统使得部落成员普遍认可的大家庭其核心组成是拥有共同曾祖父的男性子嗣。大家庭层级之上是家族,它范围更广,类似于一个拥有数百名成员的庞大家庭。^③一个庞大的大家庭经过至少三代的人口繁衍和家族兴旺,规模便可扩大为氏族。氏族内部存在同族禁婚规则,部落的出现却可以打破这一约束,部落是独立的族社会共同体^④。在伊拉克,部落一词更常用,指“一群说同一种语言甚至是方言的人,典型特征是有一个可追溯到很久以前的父系祖先”^⑤。随着氏族和部落组织对生产力不断改善,原始集团不断扩充,随即出现了部落联盟。沙马尔(*Shammar*)、贾布尔(*Jabbur*)、杜莱姆等都是伊拉克著名的部落联盟。部落联盟是组织结构中最大的一层,其首领通常由主要部落的首长担任,但内部往往呈现较为松散的团结特征。

（三）伊拉克部落冲突长期存在且根深蒂固

部落冲突长期存在于伊拉克社会,是理解国家建构中部落问题持续涌现的关键。部落冲突涉及部落文化、历史积怨、资源争夺、政治权力博弈等多方面原因。第一,亲属血缘的排他性传统。完成亲属之间的义务在部落民眼中具有最高道德意义。^⑥当某个部落民与他部落的成员发生冲突时,其血缘伙伴出于履行部落义务,一般会介入相关冲突以提供支持。第二,民族与教派矛盾的长期沉淀。库尔德人与阿拉伯人的矛盾,雅兹迪人、土库曼人等少数民族群与阿拉伯主体民族的矛盾,什叶派与逊尼派的矛盾等,不可避免地加剧了部落分歧与冲突。第

① Hussein D. Hassan, *Iraq: Tribal Structure, Social, and Political Activities*, p. 2.

② Faleh Abdul-Jabar and Hosham Dawod, eds., *Tribes and Power: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in the Middle East*, p. 74.

③ Hussein D. Hassan, *Iraq: Tribal Structure, Social, and Political Activities*, p. 2.

④ [苏]C·T·卡尔塔赫强:《部落、部族与民族》,华辛芝摘译,载《民族译丛》1985年第4期,第12-22页。

⑤ Hosham Dawod, *The Sunni Tribes in Iraq: Between Local Power, the International Coalition and the Islamic State*, The Norwegian Peacebuilding Resource Centre, September 2015, pp. 1-4.

⑥ [美]R·M·基辛:《文化·社会·个人》,甘华鸣等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5页。

三,资源争夺引发部落冲突。在干旱季节,一些部落会侵入其他部落领地争夺水源、牧场等资源,进而产生部落间冲突。第四,政治权力博弈激化部落冲突。萨达姆时期,为打击南部什叶派叛乱,蓄意实施“沼泽排干”^①计划,导致马丹人^②(*Ma'dān*)部落被迫迁徙,与其他部落爆发冲突。

综上,伊拉克部落分布与族群教派、地理环境等因素交织,部落组织结构动态复杂,部落冲突根深蒂固,凸显了部落问题始终是国家建构中无法回避的核心议题。因此,厘清国家建构各个历史阶段部落与国家间的互动关系至关重要。

二、历史嬗变：伊拉克国家建构中部落与国家的关系互动

在伊拉克,部落的历史远比国家更绵长。奥斯曼帝国期间,伊拉克 90% 领土甚至一度被部落联盟所控制。^③ 20 世纪以前,部落一直享有较大自治权。^④ 因此,当伊拉克开启民族国家化进程时,部落势力便与新生国家间展开了复杂互动。

(一) 英国殖民统治下伊拉克部落与民族的国家化开端(1914~1958 年)

1920 年,英国获得对伊拉克的委任统治权后,选择扶植费萨尔(1921~1933 年在任)担任伊拉克国王,伊拉克自此成为哈希姆王室统治下的君主立宪制国家。1914 年至 1958 年间,部落与国家间关系始终夹杂着英国殖民统治的特性。

第一,以部落为主体力量参与的反英起义,在伊拉克国家建构中播下民族主义“火种”。英国殖民统治期间,伊拉克反英起义不断,尤以 1920 年起义影响最大。这次起义的主体力量是以什叶派部落为主。6 月,以鲁迈萨的部落为开端,卡尔巴拉、纳贾夫和整个幼发拉底河中游先后爆发起义;8 月,起义部落攻击萨马瓦及联结巴格达、波斯、法鲁贾的铁路,英军仓惶放弃迪瓦尼亚、希特等地。^⑤ 然而,起义最终还是失败了。失败原因也与部落力量分化有关。起义中,幼发拉底

① “沼泽排干”意为将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冲积形成的湿地排干,最初是以“农业开发”为名,开展小规模实施。此后,萨达姆政权为报复“沼泽阿拉伯人”和什叶派支持参与 1991 年起义以及窝藏反抗者,加速“沼泽排干”进程。这一行动不仅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而且使众多“沼泽阿拉伯人”流离失所。

② 马丹人(*Ma'dān*)也称“沼泽阿拉伯人”(*Arab al-Ahwār*)。

③ Faleh Abdul-Jabar and Hosham Dawod, eds., *Tribes and Power: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in the Middle East*, p. 75.

④ 黄民兴:《伊拉克民族构建问题的根源及其影响》,第 44-48 页。

⑤ 黄民兴:《中东国家通史:伊拉克卷》,第 177 页。

河各部落的军事行动尽管有“老练的军官负责训练和指挥”，但是总体上“行动很不协调”^①；一些规模较大的逊尼派部落未能成为支援力量；一些库尔德部落意图借助英国势力谋求自治等。尽管如此，该起义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伊拉克民族意识的觉醒，“被压迫的伊拉克民族”被引入宗教和世俗力量的政治话语中^②。

第二，英国实施部落分化政策，并选择部落酋长合作。初始，英国对伊拉克的政策存在两种倾向：一种主张借助部落组织结构来间接统治伊拉克；另一种主张削弱部落忠诚，提倡以现代化方式管理伊拉克。后来，英国经过权衡，选择了前者。具体而言，英国对部落实施分化政策，通过孤立瓦解、军事镇压等手段打击反英部落，通过“推迟部落解体进程、推行部落争端法、鼓励酋长进入国会、实行税收优惠、发放补助金给酋长”^③等措施，扶持亲英部落和拉拢中立部落。英国一般会与大部落且能为其服务的酋长进行合作。^④ 作为回报，这些部落会帮助英国进行统治。据悉在 1920 年反英起义中，由穆齐尔·菲伦 (Muzzier Al-Fir‘oun) 领导的法塔拉 (Al-Fatla) 部落曾帮助英国 200 名驻军人员从阿布·西克尔 (Abu Sikhair) 撤退。^⑤

第三，伊拉克库尔德问题涌现，引发库尔德部落起义与库区政党化兴起。1921 年，英国宣布费萨尔担任伊拉克国王后，伊库尔德部落起义频繁。巴尔扎尼部落也逐渐活跃，并以艾哈迈德·巴尔扎尼 (Ahmed Barzani, 又称“谢赫艾哈迈德”) 及其弟穆斯塔法·巴尔扎尼 (Mustafa Barzani, 又称“毛拉穆斯塔法”) 为领导核心^⑥。1943 年，毛拉穆斯塔法在起义中首次打出民族主义口号，主要与该时期伊拉克“青年组织”“希望”“革命”等政治组织兴起有关。1946 年，毛拉穆斯塔法联合多个政治组织成立伊拉克库尔德斯坦民主党 (Kurdistan Democratic Party,

① [英] S. H. 朗里格：《伊拉克 1900-1950 (上册)》，北京师范大学《伊拉克》翻译小组译，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270 页。

② Faleh Abdul-Jabar and Hosham Dawod, eds., *Tribes and Power: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in the Middle East*, p. 294.

③ 黄民兴：《中东国家通史：伊拉克卷》，第 181 页。

④ Hanna Batatu, *The Old Social Classes and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in Iraq: A Study of Iraq's Old Landed and Commercial Classes and of Its Communists, Ba' thists, and Free Office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123.

⑤ Faleh Abdul-Jabar and Hosham Dawod, eds., *Tribes and Power: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in the Middle East*, p. 295.

⑥ 艾哈迈德·巴尔扎尼常被学界称为“谢赫艾哈迈德” (Sheikh Ahmed)，穆斯塔法·巴尔扎尼常被学界称为“毛拉穆斯塔法” (Mullah Mustafa)，为了统一规范，全文后续表述以学界一般称谓为准。

以下简称“库民党”)。由于伊库区彼时的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导,部落依旧是有效进行社会动员与资源整合的社会组织形态,库民党成立时因此带有浓厚的农村和封建色彩^①,库民党内部也形成了以毛拉穆斯塔法为代表的农村部落势力,和以易卜拉欣·艾哈迈德为代表的城市左翼力量。1947 年,毛拉穆斯塔法逃亡苏联,库尔德部落起义相对沉寂,库民党被城市左翼力量所主导,后者主张推翻封建王朝并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引起一些保守的部落酋长和伊政府的反对,部落与国家的互动也因库区政党化而变得复杂。

(二) 卡塞姆和阿里夫兄弟执政时期的部落与国家关系(1958~1968 年)

1958 年,卡塞姆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哈希姆王朝,伊拉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主权国家^②,并建立了共和制政体。从 1958 年到 1968 年,伊拉克先后经历了卡塞姆执政(1958~1963 年在任)、复兴党短暂执政(1963 年 2~11 月)、阿里夫一世(1963~1966 年在任)、阿里夫二世(1966~1968 年在任)执政的政权更迭。此间,部落与国家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卡塞姆对以毛拉穆斯塔法为首的库民党及其所依附的巴尔扎尼部落的态度由联合转向对抗。卡塞姆上台初期,为拉拢政治盟友,选择承认库尔德民族特性、提高库尔德人政治地位、释放被关押的库尔德领导人、邀请毛拉穆斯塔法回国、允许库民党在伊拉克取得合法地位等。作为对卡塞姆的回报,库民党初期选择配合卡塞姆对纳赛尔主义者、伊拉克共产党、反政府库尔德部落的打压行动。此后,随着卡塞姆政权日益稳固,卡塞姆担心毛拉穆斯塔法势力扩大将导致库尔德人寻求自治或独立,转而采取抓捕库民党成员、取缔库尔德宣传刊物等一系列限制库民党的行动,并给予泽巴里、苏尔切斯等一些亲政府库尔德部落重金和武装支持,以此对抗巴尔扎尼部落。对此,库民党和巴尔扎尼部落决定作出反击,导致区域冲突不断。

第二,卡塞姆推行的世俗化改革对部落势力形成一定压制。1958 年伊拉克共和国建立后,政府废除 1933 年颁布的《农民权利义务法》和《部落争端法》^③,打破了部落地区司法独立的现状。1958 年 9 月,政府颁布《土地改革法》,以国家

① 李睿恒:《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两党政治格局的演化》,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 年第 6 期,第 3-16 页。

② 刘月琴:《英国对伊拉克殖民统治方式的演变》,载《西亚非洲》1994 年第 5 期,第 48-53 页。

③ Phebe Marr, *The Modern History of Iraq*,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12, p. 98.

法律的形式大规模重新分配土地,并设置土地持有最高限度^①。根据法律,农民被要求在20年内付清地价并支付3%的利息。^②卡塞姆还宣布废除部落地产的合法地位,对经常逃税的部落首领征收新税种。由于政权阶级局限等因素,土改未能达到预期成效。截至1963年,约有450万杜诺姆土地被政府征用,但实际上只分配给农民150万杜诺姆土地^③,且由于农民无法使用地主的耕作机器^④,农业大幅减产。对部落酋长而言,土改后仍能从政府租用到一定规模的土地,其特权地位仍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值得肯定的是,卡塞姆的社会改革使农业人口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解放,有限打击了部落酋长在内的大地主阶级特权,是推进伊拉克现代国家建构的积极尝试。

第三,阿里夫兄弟以阿拉伯民族主义为意识形态工具调整部落关系。阿里夫上台后,抛弃了卡塞姆时期“伊拉克民族主义”的路线,转而推行“阿拉伯民族主义”。阿里夫不仅借助国有化政策剥夺限制什叶派和库尔德人的政治经济权利,而且还将这些歧视性政策冠以民族主义美名,表现为通过质疑什叶派和库尔德人的起源以及对伊拉克的忠诚,促使逊尼派(包括伊斯兰主义者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将接近80%的伊拉克人口排除在族际政治整合之外。^⑤这无疑加剧了什叶派、库尔德部落对阿里夫政权的不满。这一时期,库民党与伊政府间的不信任加深,毛拉穆斯塔法的部落武装与伊政府军间冲突频发,为后续国家建构中政治的宗派化埋下了伏笔。

(三) 复兴党执政期间伊拉克的部落与国家关系(1968~2003年)

1968年7月,二次上台执政的复兴党吸取此前政权失败教训,致力于打击复兴党以外的政治派别和压制党内反对派势力,独裁主义的霸权结构逐渐显现。在此背景下,部落广泛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并与国家的互动关系更为明显。

一方面,部落成为复兴党政权管控伊拉克的政治工具。复兴党比较倚重与国家精英阶层关系紧密的逊尼派部落。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提克里特下属纳

① 土地持有最高额为灌溉土地1,000杜诺姆、旱地2,000杜诺姆。土地被分配给农民,农民可分得30~60杜诺姆灌溉区土地,60~120杜诺姆旱地。其中,杜诺姆(Dunam)为中东地区常用的面积测量单位,在伊拉克,1杜诺姆相当于2,500平方米。

② Phebe Marr, *The Modern History of Iraq*, p. 98.

③ 黄民兴:《中东国家通史:伊拉克卷》,第235页。

④ [伊拉克]贾希姆·穆罕默德·海拉夫等:《伊拉克地理》,兰亭等编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141页。

⑤ 冯焱:《中东现代民族国家构建典型个案研究:伊拉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32页。

赛尔部落(Nasir)分支下的贝贾特(Beijat)氏族,复兴党两任最高统治者贝克尔和萨达姆均来自该氏族。因此,众多贝贾特氏族亲属得以进入复兴党、议会、政府、军队等现代官僚体系。萨达姆也依托部落建构权力保护网:第一圈层即核心圈层依附部落亲属关系,主要包括同母异父三兄弟巴尔赞(Barzan)、萨巴维(Sab'awi)、瓦特班(Watban),来自马吉德家族的政要人物,以及直系亲属如大儿子乌代(Uday)、二儿子库赛(Qusay);第二圈层是来自家乡提克里特的部落;第三圈层是“逊尼派三角地带”的部落;第四圈层是萨达姆的个人追随者。^①萨达姆藉此加强了个人在复兴党内和国家的绝对权威。

另一方面,部落主义逐渐被复兴党政权纳入国家政治认同中。20 世纪 80 年代前,部落虽实际参与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但部落主义却被复兴党统治者在公开场合贬低为传统落后的因素。80 年代后,随着两伊战争、海湾战争相继爆发以及南部什叶派起义等,伊拉克国家实力下降,萨达姆不得不与部落势力结盟。海湾战争结束不久,萨达姆就在总统府亲自接待一些部落酋长,这些酋长将萨达姆视为部落最高首领,宣誓效忠萨达姆。一名观察员曾表示,“部落的旗帜被降下,并投向共和国的总统”^②。萨达姆也对忠于他的部落施以更大恩惠:一是划定大约 50 个酋长区,由酋长确保区域安全稳定^③;二是部落享有处理内部事务的司法免于干预权限;三是进一步扩大部落成员在议会、内阁以及安全机构中的比例。以议会选举为例,来自贾布尔部落的候选人从 1989 年的 27 名增加到 1996 年的 31 名,杜莱姆部落从 15 人增加到 26 人^④;四是将土地改革中没收的地主土地重新分配给部落酋长^⑤;五是在公开场合赋予部落酋长荣誉身份。

然而,上述做法在伊库区却因两政党格局的逐渐确立而遭遇困境。1975 年,贾拉勒·塔拉巴尼因与毛拉穆斯塔法政见不合,选择脱离库民党另组建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Patriotic Union of Kurdistan,以下简称“库爱盟”),从此奠定了伊库区两党主导的政治格局。如果说在 1991 年前,伊中央政府还能通过向伊库区亲政府部落提供政府拨款、武器装备、生产生活资料等方式,间接影响库区政

① Faleh Abdul-Jabar and Hosham Dawod, eds., *Tribes and Power: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in the Middle East*, pp. 120–123.

② Ibid., p. 92.

③ 梁娟娟:《伊拉克阿拉伯部落问题起源的历史考察》,第 165–188 页。

④ Faleh Abdul-Jabar and Hosham Dawod, eds., *Tribes and Power: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in the Middle East*, p. 157.

⑤ 韩志斌:《民族主义建构中的政治认同——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政治实践个案考察》,第 16–22 页。

党、调控库尔德部落关系以及庇护民众的话,那么,这种恩庇关系在1991年海湾战争后发生了转变。受限于国内外形势,伊中央政府不得不缩减对库区的财政拨款,一些亲政府库尔德部落纷纷转变立场,倒向由两党所组建的恩庇系统。该时期,库民党和库爱盟作为该地区的实际治理主体,开始取代原有的亲政府部落成为库区内部新的庇护者。^①

(四) 后萨达姆时期伊拉克部落与国家的关系(2003年至今)

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伊拉克就此陷入后萨达姆时期的历史漩涡。那些曾被萨达姆政权或压制、或利用的传统部落组织,非但未在权力洗牌中销声匿迹,反而成为影响伊拉克国家重建的重要力量。

一方面,国家对部落的管控有限。2005年10月,伊拉克全民公投通过永久宪法,规定实行联邦制。这一政治体制削弱了国家对地方的管控,也让部落问题与种族宗派间的对立相交织。同年12月,伊拉克举行正式议会选举,在总计275个席位中,什叶派、库尔德以及两个逊尼派政党联盟分获128席、53席和55席^②。由此,什叶派执掌中央政权。逊尼派则遭到边缘化,宪法明确禁止前复兴党成员担任总统、总理、议会、司法等职务。^③这使得长期以来享有较高政治话语权的阿拉伯逊尼派不满,他们认为“去复兴党化”本质上是“去逊尼派化”。一些逊尼派部落由此开展了对美军和伊政府的报复性行动。在伊库区方面,库民党和库爱盟完成了从民族主义武装运动向实际地区执政者的转型,部落角色逐渐被政党取代。对库区政党来说,通过控制预算、授予部落精英公职身份、向部落提供就业岗位等恩庇举措,有利于政党巩固选票和政治动员。对部落来说,依附政党恩庇体系,不仅能得到庇护,还能获取政治经济权益。库区政党与部落网络的这种合作关系,确保了库区政府在其管辖范围内的相对稳定,代价却是强化了一个“国中之国”的格局。对伊中央政府而言,这也意味着在库区面对的不是分散的、容易被各个击破的部落,而是将部落力量进行整合且处于强势发展势头的库区政党。此外,来自安全、经济等方面的困境,也使国家难以集中精力管控部落。正如从事伊拉克法律与政治研究的学者哈立德·阿尔达维(Khaled al-Ardawi)所述,“当伊中央政权被削弱时,无论是由于外部入侵还是内部政治冲突,部落的声

① 李睿恒:《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两党政治格局的演化》,第3-16页。

② 肖凌:《伊拉克、黎巴嫩、巴勒斯坦政治结构比较研究》,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9年第1期,第74-80页。

③ 韩志斌、薛亦凡:《伊拉克复兴党的兴衰成败与现实影响》,第54-82页。

音往往会越来越响亮”^①。

另一方面,部落对战后伊拉克国家建构具有双重影响。萨达姆政权崩溃后,部落势力趁机扩大政治社会影响,并在保护部落民安全、维持地方秩序等方面展现出传统社会组织的韧性。这一积极作用也在部分民众中得到认可。2004 年,在一项关于巴格达民众对伊拉克部落作用的民意调查中,商人沙克尔认为“部落领袖仍至关重要,并呼吁在政治机构中赋予其强有力的代表权”,来自巴格达南部哈里希(al-Harishi)部落的首领费萨尔·卡西姆表示“部落首领应在当前政治局势和政治实践中发挥关键作用”,政治分析家哈尼博士强调“部落领袖是人民的重要象征”;也有受访民众认为,部落首领未能与社会不同阶层的部落成员在政治或知识上加强联系,因此,他们反对部落首领的任何角色。^②如民意显示,部落的确对国家建构发挥着消极影响:一些部落与不同族群教派政治势力相结合;一些部落与极端组织合流;一些边境部落逐渐演化为国家的敌人等。对库尔德部落来说,其部落网络也与库区政党间存在竞争关系。库民党和库爱盟间的政党竞争常带有部落对峙底色,其中,库民党背后主要是以毛拉穆斯塔法为代表的巴尔扎尼部落,库爱盟背后主要是以塔拉巴尼为代表的塔拉巴尼家族成员。潜在的部落竞争因素使两党内部及两党间存在争夺较量,结果便是库区政府的关键职位和资源被协调分配给与两党领导层关系密切的家族成员。这不仅加剧了制度化的腐败与任人唯亲现象,而且容易引发两党间政治冲突。长此以往,必然加剧库尔德内部分裂,从而破坏伊拉克北部边境的整体稳定。

综上,部落与国家的关系始终是贯穿伊拉克国家建构进程的关键线索,并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复杂的互动图景。同时,这种互动并非静态的对抗或融合,而是在传统社会组织模式与现代国家建构逻辑的持续博弈拉扯中进行的。

三、结构张力：伊拉克部落传统与国家建构间的现实矛盾

结构张力是部落问题持续影响伊拉克国家建构的根源和逻辑机理。这种结

① [伊拉克]贾巴尔·扎伊丹:《伊拉克部落:一只眼睛关注社会,另一只眼睛关注政治》(阿拉伯文),独立阿拉伯语电视台,2025 年 4 月 11 日, <https://www.independentarabia.com/node/621540/>,上网时间:2025 年 10 月 20 日。

② [伊拉克]卡里姆·侯赛因·纳阿码:《伊拉克部落在支持派和反对派之间的政治作用》(阿拉伯文),半岛电视台,2004 年 2 月 4 日, <https://www.aljazeera.net/news/2004/2/4/الدور-السياسي-للعشائر-العراقية-بين>,上网时间:2025 年 10 月 19 日。

构张力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新旧对立,而是部落传统与国家建构在权力逻辑、秩序供给、安全保障、认同基础等层面存在根本性差异的结果。

(一) 部落权力与国家权力的拉锯博弈

部落权力是指部落在特定语境中形成的对部落成员和事务的实质性支配能力,以及在与国家、族群等互动中展现的动态影响力。纵观伊拉克国家建构,国家权力始终绕不开同部落权力的拉锯博弈。

第一,在权力来源上,部落权力植根于部落社群的历史认同、血缘关系、传统习俗等部落文化基础,其合法性源于部落成员对部落首领的自愿服从以及对部落荣誉的自觉维护。伊拉克国家权力框架则是外部塑造与本土传统相结合的产物。后萨达姆时期,伊拉克实行联邦制,国家权力主要基于现代政治合法性原则,强调法理权威,体现为宪法对“伊拉克共和国”的主权定义、对军队和警察暴力使用权的明确赋予等。然而,在伊拉克国家建构中,部落权力的自主性往往使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在部落群体中被弱化。例如,部落酋长权力获得更多依赖“血缘纽带”“家族威望”等世袭传统,而非来自国家任命。

第二,在权力运行上,部落基于社会关系网络,其治理具有高度人格化和灵活性。国家权力则与之不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曾关注过现代国家如何“立”得住的问题,认为“国家是在一定区域的人类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在本区域之内,……要求(卓有成效地)自己垄断合法的有形的暴力”^①。在韦伯看来,现代国家需要建立合法型统治,而“合法型统治的最纯粹类型,是那种借助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班子进行的统治”^②。这种国家权力运行逻辑在一些部落地区常常会遭遇失败。当部落产生纠纷时,更多通过“血亲复仇”“家族联姻”等传统方式解决,而非诉诸国家机关。

第三,在权力覆盖上,部落以聚居区为核心,通过部落武装严密控制着包括土地、水源等在内的部落资源。国家权力则要求“完全渗透整个社会,规范社会关系的特质,收取税收,分配资源以决定经济生活性质,以及控制人们最为珍视的象征符号”^③。例如,伊库区的政党化的发展重塑了库区政党与传统部落网络间的竞合关系,这种关系构建出一套具有高度韧性内部却又碎片化的地方权力

①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31页。

② 同上,第245页。

③ [美]乔尔·米格代尔等主编:《国家权力与社会势力:第三世界的统治与变革》,郭为桂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9页。

结构,深刻塑造了伊库区“国中之国”的现实,这无疑是对国家权力覆盖的严重削弱。

部落权力与国家权力间的拉锯博弈,既体现了部落作为传统社会结构的顽强韧性,又折射出了国家权力自身的脆弱性。对伊拉克国家建构而言,权力结构间的张力不仅会阻碍国家权威的统一与渗透、削弱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影响国家整合,而且还会使国家在应对外部威胁时降低集体应对能力。

(二) 部落习惯法与国家法律体系的规范冲突

部落习惯法是部落社会长期形成并传承的非成文传统行为规范体系,核心是以部落血缘和部落文化为基础,并通过口述传统、历史惯例以及社群实践维持效力,主要适用于部落的纠纷解决、权利分配等事务。部落习惯法一直是伊拉克社会的“活法”。在争端解决方面,部落内部或部落间解决争端的方式通常有两种:

一种是以血还血的血亲复仇;另一种是选择能够被争端各方认可且具有威望的“调停者”介入来协调解决。在婚姻家庭方面,部落习惯法允许部落女性童婚,规定女性婚姻选择要经过家族男性成员认可,如果女性违背家族意愿,会被视为对部落不忠,甚至会引发家族成员对其“荣誉谋杀”^①。在资源权属方面,部落习惯法主张部落长期使用的土地归该部落所有,无需国家登记,资源分配遵循“先到先得”或部落间约定好的规则进行。

相比较而言,伊拉克国家法律体系的相关规范,与部落习惯法呈现出鲜明差异。在争端解决方面,国家法律禁止私刑,刑罚依据刑法执行。在婚姻家庭方面,2005 年宪法条文明确规定“伊拉克人法律面前平等,不因性别而受歧视”。在资源权属方面,国家法律规定土地归国家所有,资源开发需经政府审批。对伊拉克来说,国家法律体系的形成晚于部落习惯法。现行国家法律体系主要是以 2005 年伊拉克联邦宪法为核心框架,其本质是伊拉克作为国家整体通过法律制度规范化规范调整社会关系、分配权利义务、维系统治秩序的工具,其效力来源的核心基础是宪法赋予的公权力,具有普适性强制的特点,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受到来自部落习惯法的规范冲突。

部落习惯法与国家法律体系间的规范冲突,往往导致民众在社会秩序遵循

^① “荣誉谋杀”是中东社会较为普遍的现象,通常主要是家族男性成员(凶手)对其家族女性成员(受害者)进行杀害,原因是前者认为后者衣着暴露、“不检点”、抗拒指定婚姻等行为会给家族蒙羞,目的是为了维护家族荣誉而亲自清洗“丑闻”。

时陷入两难,这一点在城市移民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对那些来自乡村部落社会的城市移民而言,遵循部落习惯法已成为其刻在骨子里的“基因”,这种保留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城市社区的正常生活。部落的好战和复仇传统,可能会使处理刑事或民事案件的警察、法官等受到威胁或暗杀。复兴党执政时期,革命指导委员会曾被要求发布第24号决议,强调“任何人提出部落要求来反对按照上级命令行事或执行国家法律的人,都将被处以不少于三年的监禁”^①。可见,传统规范与现代法治之间的深刻张力,影响了伊拉克国家法治权威,削弱了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与统一性。

(三) 部落武装与国家军队的周期性对抗

部落武装,是部落社会在国家建构中形成的非正规武装组织,以部落血缘网络为核心组织框架,以部落传统领地为重要依托,并以维护部落利益和武装自治权为行动目标。在武装属性方面,部落武装区别于正规国家军队,在装备、训练和指挥体系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传统民兵特征。而国家军队是依据宪法和法律建立的正规武装力量,以科层制军事体系为组织形式,以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为核心目标。二者在组织来源、力量依附、行动目标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它们在国家建构中会形成对抗局面。事实上,伊拉克自1921年建国起,就是否实行兵役制和建立国家军队一直争议不断。费萨尔认为,建立国家军队是伊拉克摆脱对英国过度依赖和确保伊拉克独立的关键。而部落酋长多表示反对,认为建立国家军队会对部落的发展壮大造成不利。同样,英国也表示反对,认为保留部落武装更符合英国利益,这也为后续国家建构中部落武装与国家军队的对抗埋下了伏笔。尤其是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美国以“去复兴党化”为名,强制解散原伊拉克军队,导致国家无法在领土范围内有效垄断武力使用权。^②大量武装人员流入部落,部落武装趁机崛起。尽管后续伊政府逐步推进国家军队重建,但其过程却依赖美国支持,这易使国家军队沦为外部力量塑造的脆弱工具,从而强化部落武装对国家军队的对抗惯性。例如,安巴尔省^③的一些逊尼派部落武装认为正是美

^① Faleh Abdul-Jabar and Hosham Dawod, eds., *Tribes and Power: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in the Middle East*, p. 99.

^② Shamiran Mako and Alistair D. Edgar, “Evaluating the Pitfalls of External Statebuilding in Post-2003 Iraq (2003–2021),” *Journal of Intervention and Statebuilding*, Vol. 15, No. 4, 2021, pp. 425–440.

^③ 安巴尔省是伊拉克西部最大的省份,因其临近叙利亚、约旦等国,是“基地”组织和武装分子跨境渗透势力的重要地区。该地区长期以来是逊尼派阿拉伯部落的聚居区。伊拉克战争后,安巴尔省成为逊尼派部落叛乱活动的中心,其中包括费卢杰和拉马迪等城市。

军占领伊拉克,才导致逊尼派面临被边缘化境遇,因此,他们初期选择与极端组织“伊拉克伊斯兰国”合作,共同对抗美国及其扶植的什叶派中央政府。这表明,外部干预在很大程度上也会成为部落武装与国家军队间冲突对抗的矛盾催化剂。

部落武装与国家军队的对抗本质上是双方围绕暴力控制权的根本冲突。对部落而言,若要放弃武装自治,不仅会被部落民视为软弱,而且可能失去与政府谈判的筹码;对伊政府而言,若单方面解除对部落的管控,可能会引发其他部落效仿,进而威胁政权安全。因此,双方极易在追求自我安全化中形成恶性循环,资源被消耗在压制部落或对抗国家上。长此以往,可能会给极端组织或外部势力干预伊拉克事务的机会,从而使国家建构陷入“想安全却更加危险”的境地。

(四) 部落认同对国家认同的撕裂排斥

部落认同是指以血缘亲属关系为根基、以部落习惯法为规范准则、以传统权威为纽带,形成的对特定部落群体的身份归属与情感忠诚,其内核体现为部落成员对忠诚团结、荣誉维护等部落文化的认同。伊拉克战争期间,一些部落对美军发动袭击,其背后就蕴含着部落文化因素。这些部落认为,美军作为“外来者”对原属部落管辖地盘的侵占是对部落声誉的挑衅和对部落利益的损害,因此誓死抗击美军成为检验部落成员忠诚团结的标准。部落认同还体现在部落名称链上。通常,一名伊拉克男性完整的部落名称链包括:本人名/父亲名/祖父名/第一子部落名/第二子部落名/第三子部落名/主要部落名,这种遵循从小到大、由内而外、由近及远的命名约定,确认了部落民对部落身份的认同。^①可见,以部落文化为核心的部落认同带有原生性、排外性与封闭性。国家认同则与之不同。国家认同是民族国家合法性的基础^②,不仅包括“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哪个国家,为什么属于,以及这个国家究竟应该是怎样一个国家的心理活动”^③,还包括反映在实践活动中的认同行为。国家认同超越特定的地域和血缘关系,是以意识形态为导向,其产生与发展带有建构性与包容性。在情感归属方面,国家认同更强调超越部落血缘、族群教派的公民共同体意识,主张所有“伊拉克人”都能热爱并维护伊拉克,从而形成将国家视为“己者”而非“他者”的感受。

部落与国家在认同基础上的张力,决定了伊拉克国家建构中易出现认同对

① Sam G. Stolzoff, *The Iraqi Tribal System*, p. 119.

② 周平:《民族国家认同构建的逻辑》,载《政治学研究》2017 年第 2 期,第 2-13 页。

③ 黄岩:《国家认同:民族发展政治的目标建构》,北京:民族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77 页。

立、社会撕裂等局面。部落认同作为次国家认同,强化内群体与外群体区分,极易将部落间的恩怨演变为群体性冲突,是引发伊拉克社会政治分裂与对抗的思想根源。对伊拉克来说,在整合部落认同问题上会陷入两难:若要强化国家认同,势必会削弱部落社会的认同;但另一方面,政府又不得不从传统的部落文化认同中汲取合法性资源,来巩固国家认同的观念。^①对部落民来说,究竟“我先是某部落的人”还是“我先是伊拉克公民”,成为部落民在身份叠层上的困惑,这种困惑会让部落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变得淡薄,进而影响部落民对伊拉克的效忠程度。

综上,上述张力矛盾不仅深刻影响着伊拉克的政治生态与社会稳定,而且折射出伊拉克从传统文明向现代国家转型中面临的结构性困境。若选择忽视这些张力矛盾,伊拉克的国家建构将步履维艰。

四、治理调适：国家建构中伊拉克解决部落问题的策略尝试

无论是部落与国家的纵向关系互动,还是部落传统与国家建构的横向现实张力,均表明部落对国家建构进程形成掣肘。因此,伊拉克对整合部落力量、调和部落利益以及推动部落民国家认同等进行了探索尝试。

(一) 将部落机制适度纳入伊拉克国家治理体系

伊拉克通过在政治实践、法律遵循、安全协同层面整合部落机制,尝试将部落的组织资源、社会影响力等转化为国家治理的补充力量,以弥补现代国家机器的治理缺陷。

首先,在政治实践层面,伊拉克试图在国家治理体系内赋予部落一定的政治参与权,以维持国家政权稳定。早在君主制时期,时任首相努里·赛义德(Nuri al-Said)就曾与杜莱姆、提克里特等大型逊尼派部落建立政治合作关系^②,以换取部落对中央政府的支持。一些部落酋长被吸收进政治系统,并被授予官方头衔,负责维持地方秩序和解决冲突等事务,使其从“非正式权威”转化为“国家认可的治理代理人”。据统计,1933年,部落首领在伊拉克议会中占有21%的议席数量,这一比

^① 闫伟、刘伟:《部落问题:阿富汗国家重构的制度困境与社会危机》,载《南亚研究》2021年第1期,第112-134页。

^② [伊拉克]沙欣·西哈姆·阿卜杜勒·拉扎克:《努里·赛义德在伊拉克的行政和社会影响》(阿拉伯文),载《基础教育学院杂志》2024年第128期,第158-173页。

例在 1954 年增加至 28%^①。萨达姆执政时期,伊拉克更是出现了国家机构的部落化现象,与萨达姆关系密切的逊尼派部落成员大量进入政府、议会等国家机构,以巩固其独裁统治。后萨达姆时期,由于伊拉克现代国家机构在基层社会的渗透能力较弱,伊政府不得不继续允许或默认部落势力进入国家体系,具体表现为议会选举中政党与部落的结盟合作、部落精英通过议会和政府机构参与对国家的管理、地方治理中部落代表介入公共事务等。在这一过程中,伊拉克试图对部落政治功能进行主动重塑,使部落在血缘动员、基层权威、冲突调解、服务部落民等方面的功能重新定向为服务国家稳定的工具,从而让国家政治触角延伸至中央政府难以直接覆盖的区域,来提升国家治理的影响力。从伊拉克国家建构的政治实践来看,政府对部落赋予政治参与权,虽然易产生部落割据、国家制度碎片化等风险隐患,但在特定历史阶段却具有弥补现代官僚体系“末梢失灵”、部分缓解国内教派与族群矛盾、降低国家与社会的对抗性成本等优势。

其次,在法律实践层面,伊拉克试图在国家法律原则基础上有限承认部落习惯法,以更好管理复杂且庞大的部落人口,以及防止部落习惯法完全游离于国家法律框架外形成“法外治理空间”。1924 年,伊拉克国民代表大会正式批准《部落争端法》,赋予部落首领处理部落争端纠纷的合法权力,这意味着部落习惯法在国家层面拥有了一定的法律地位。^②事实上,英国殖民统治者和费萨尔通过立法将部落首领的权力制度化,实现了对部落民更为便捷且适用的管理。此后,卡塞姆在社会改革中曾试图废除《部落争端法》,但却遭遇部落社会的反对,再次印证了有限承认部落习惯法对维护国家政权稳定的重要性。时至今日,伊拉克仍有限承认部落习惯法的补充性作用,具体表现为:在当前伊拉克国家法律框架内,承认部落习惯法在联邦和省法律目前无法有效执行的偏远地区的合法性,即这些问题与争端可由部落酋长合法解决。有时依据部落传统中的交换人质、支付赔偿金、共同宣誓等“和解仪式”争端解决,要比单纯的国家法律制裁更有效力。部落酋长依据部落习惯法承担义务、履行职责,还可获得国家报酬补贴或政策性资金支持。当争端解决超出部落酋长在部落习惯法下的管辖范围或处理能力,部落酋长可请求国家司法部门介入,而这可能会促使伊拉克政府探索出承认部落法律并将其纳入联邦和省政府框架内的其他方法。^③

① Sherko Kirmanj, *Identity and Nation in Iraq*,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13, p. 41.

② 冯焱:《中东现代民族国家构建典型个案研究:伊拉克卷》,第 178 页。

③ Sam G. Stolzoff, *The Iraqi Tribal System*, p. 29.

最后,在安全协同层面,伊拉克试图寻求与地方部落武装进行合作,以应对复杂的安全局势。在伊拉克国家建构中,政府与部落武装合作的案例并不少见。萨达姆执政中后期,为应对国内外安全局势,对部落的态度转向务实,主动吸纳部落武装作为政权的辅助力量。在两伊战争中,伊拉克将阿拉伯民族主义作为政治认同理念,号召国内什叶派阿拉伯部落武装参与对伊朗作战。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什叶派部落武装逐渐响应国家战争动员,开始在巴士拉、乌马拉、库特、古尔纳和南部沼泽地区同伊朗作战。后萨达姆时期,由扎卡维创立的“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伊拉克伊斯兰国”在兴起过程中精准利用了逊尼派被边缘化等不满情绪,不断在安巴尔省等逊尼派地区扩张,对伊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此后,由于“伊拉克伊斯兰国”散布极端思想、过度干预部落传统、恐吓威胁部落成员、损害部落酋长权益等,当地一些逊尼派部落开始联合组建“安巴尔拯救委员会”(Anbar Salvation Council)来反对该组织,这场运动也被称为部落“觉醒运动”(Awakening Movement)。此种形势下,美军以及伊政府抓住契机,采取联合逊尼派部落武装以抗击“基地”组织的安全策略。美军负责人开始频繁拜访逊尼派部落领导人,不仅主动学习部落文化,还向部落提供各种政治承诺,推动马利基政府同逊尼派部落加速政治和解。马利基政府此后同意将20%的“觉醒运动”成员纳入伊安全部队,并为其余成员提供非安全工作岗位。^①事实证明,与部落武装的合作,使伊拉克在对抗极端组织以及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成效显著。但这种安全合作本质上受权力交换与利益博弈影响。后期,随着“基地”组织力量衰微,安巴尔部落同美国和伊拉克政府的联盟再次分裂^②,国家安全再次遭遇挑战。

(二) 借现代化进程来削弱部落的经济社会基础

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是伊拉克国家建构的目标之一。在这一过程中,伊拉克试图通过土地改革、国有化政策、城市化推进、现代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一系列现代化改革措施,来削弱部落的经济社会基础和强化中央集权。

首先,伊拉克试图用国家主导的资源分配,削弱部落的经济依附关系。传统部落社会中,部落控制着土地、农业生计、救济、手工业与商业贸易网络等核心资源,部落民出于资源获取与生存依赖,形成对部落的深度经济依附。但在现代化进程中,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伊拉克试图通过土地改革、石油国有化等现代化改

^① 文少彪:《利益、信息与偏好:美军与安巴尔部落镇压叛乱的代理人战争》,第61-84页。

^② 分裂主要基于几种因素:一是逊尼派部落内部对“基地”组织的态度上存在派系之争;二是美国及伊政府并未对部落兑现所有政治承诺,马利基政府意图把重建援助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而非部落手中;三是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在某种程度上释放了逊尼派部落势力。

革举措,使国家成为最大的资源掌握者。在土地改革中,政府将部落控制的大片土地,尤其是耕地、牧场收归国有,并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将其重新分配给农民,赋予农民农业经济活动自主权,规定农民可直接向政府缴纳地租而非向部落酋长缴纳贡赋。政府此举直接削弱了部落以土地换忠诚的基础,意味着个体农民的农业生计不再依赖于部落分配和受部落的生产指令约束,而是与国家的土地管理制度相挂钩。在石油国有化方面,国有化后石油资源能够为伊拉克财政带来丰厚收益,是国民经济起飞的重要转折点,政府可直接掌握经济命脉。由于政府将石油收益用于就业岗位提供、社会福利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部落民的经济活动逐渐依赖国家而非部落。在 20 世纪 70 年代石油繁荣期,政府雇佣大量部落民进入石油公司,“国家工资”成为部落民的主要收入来源,这种绕过部落直接由国家分配给部落民资源的经济活动,无疑弱化了部落民对部落的经济依附关系。

其次,伊拉克试图推进部落居住格局重组,打破部落传统边界。一是实施部落定居政策。早在君主制时期,伊拉克就曾推行部落民定居以加强中央集权,通过经济激励政策鼓励阿拉伯部落到摩苏尔等北部地区定居,以改变库尔德聚居区的人口结构。萨达姆执政时期,政府又在库尔德传统聚居区划定“阿拉伯化区域”和建立阿拉伯定居点,并迁入中部和南部的阿拉伯游牧部落,给予阿拉伯人工作、住房等优惠政策。二是重新划定行政归属。政府通过频繁调整省份边界,将库尔德人占绝对多数的基尔库克省的部分地区划归萨拉赫丁省、迪亚拉省,稀释库尔德人在战略要地基尔库克的人口比例等,试图以此瓦解库尔德部落与传统领地的紧密联系。三是推进城市化进程。在伊拉克,以传统部落社会为主的农村与以现代化生活为特色的城市差异明显。^① 20 世纪 50 年代后,伊拉克农村部落人口开始向城市大规模迁徙。70 年代,随着石油工业迅猛发展,伊拉克城市化步伐加快。城市人口从 1970 年的 5,452,400 人增加到 1980 年的 9,120,300 人,城市人口比例从 57.8% 提高至 69%。^② 据 1975 年一项针对巴格达城市移民的调查显示,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就业机会以及对更高收入和更好食物的渴望,是部落民众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重要动机。^③ 城市人口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伊农村地区的游牧部落人口。在一些部落民移入城市后,其居住空间逐渐向定居

① David E. Long, Bernard Reich and Mark Gasiorowski,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p. 133.

② Marion Farouk-Sluglett and Peter Sluglett, *Iraq Since 1958: From Revolution to Dictatorship*,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7, p. 246.

③ Ibid., p. 247.

化、开放性、包容性转变,部落民被分散在城市的混合社区中,邻里关系和职业交往逐渐取代了单一的部落血缘关系,这进一步弱化了部落的社会控制能力。

最后,伊拉克试图建立现代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公共服务体系,来降低部落的社会影响力。教育方面,早在君主制时期,伊拉克就制定了国家主管的现代教育体制,时任教育总长的萨提·胡斯里(Sati al-Husri)通过设立全国标准化课程体系和统一考试制度、反对教区学校发展、鼓励全国学生前往首都上学等举措,来强化伊拉克爱国主义教育。1973年石油国有化后,依托石油产业丰厚收益,复兴党开始推行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免费教育。1978年12月,伊拉克开展为期3年、覆盖部落地区的全国性扫盲运动,扫盲对象涵盖15~45岁的伊拉克公民,其中妇女有1,535,940人,占女性总人数的44%;扫盲范围包括城市、乡村、山区与沙漠地区,在游牧部族地区还设有流动学校;扫盲资金由1976年预算拨付的6,695万伊拉克第纳尔增加到23,600万伊拉克第纳尔。据统计,在扫盲运动推进中,1979~1980年伊拉克女孩小学入学率由1970~1971年的29%提高至45%。^①这一时期国家推动的现代教育体系,尽管在实践中遭遇来自乡村地区一些男性部落民的不理解,但从总体上看不仅促进了部落地区教育观念普及和妇女解放,而且有利于削弱部落传统价值观以及促使民众接受复兴党民族主义元素。此外,在医疗、养老、住房等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方面,伊拉克致力于提高社会服务能力。卡塞姆时期,伊拉克花费在健康、教育和保障性住房建设等社会福利计划上的款项,是君主制时期最后一次预算的两倍^②。萨达姆统治后期,伊拉克政府实行定量供给制,每个伊拉克人每月可按供应卡领取免费生活物资。^③后萨达姆时期,伊政府极力促进一些受打击“伊斯兰国”战争影响的部落地区公共服务的恢复。据统计,在提克里特这一部落聚居区域,截至2016年底,当地已重新开放8个卫生中心、5处供水设施、7所学校及3处电力设施。^④以上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是政府削弱部落传统互助功能、强化民众对国家依附的重要手段。

① 韩志斌:《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7~124页。

② [美]塔比特·A.J.阿卜杜拉:《伊拉克史》,张旭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32页。

③ 张维秋:《中国驻中东大使话中东:伊拉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版,第180页。

④ Roz Price, "Iraqi State Capabilities," *K4D Helpdesk Report*,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May 18, 2018, <https://www.ids.ac.uk/publications/iraqi-state-capabilities/>, 上网时间:2025年10月7日。

（三）以“仪式—记忆—符号”培育部落民国家认同

在国家建构中,部落民对部落社会血缘社群的原生认同始终是国家整合的深层挑战。为此,伊拉克试图通过仪式、记忆、符号将部落民的日常生活场景与国家叙事深度绑定,培育“想象的共同体”^①和强化部落民的国家认同。

首先,伊拉克通过国家仪式来培育部落民国家认同。国家仪式是由国家权力机构开展的规范化、程序化的象征性活动^②,在强化国家认同方面发挥着独特功能。伊拉克在国家仪式设计与推进中,有意识地嵌入部落元素。在仪式主体上,政府邀请部落酋长或有名部落人士参与。自 2003 年以来,伊拉克官方围绕 1920 年革命起义的纪念仪式不断举行,出席者中既有政府代表,又有部落酋长以及起义参与者的后人。^③在仪式内容上,政府选择性融入部落文化。复兴党时期,伊拉克在摩苏尔举办的新春节仪式,不仅通过花车巡游展现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特征,而且串联库尔德诺鲁孜节传统,试图以此展现阿拉伯与库尔德人的兄弟情谊。在以弘扬民间诗词为主的什叶派纳西里耶地区,政府又专门举办古代流行诗词节,来团结什叶派民众。^④在仪式展演上,政府依托多种仪式要素来强化部落民国家认同。以建军节阅兵仪式为例,领导人致辞、现代化国家军备展示、受阅部队整齐队列、民众欢呼等仪式展演,将伊拉克正走向强大的国家形象具象化,从而增强部落民对国家的自豪感与归属感。有学者曾对以难民身份定居在土耳其的逊尼派伊拉克土库曼人(共计 180 名受访者中有 179 名为部落民身份)进行过国家认同调查,结果显示:82%受访者表示自己很幸运能成为伊拉克人,81%受访者对伊拉克的成就与进步感到满意,68%受访者希望伊拉克保持统一以彰显国家认同的力量。其中一位受访律师这样陈述:“在伊拉克境内,我们被称为土库曼人;但在伊拉克境外,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是伊拉克人。”^⑤也有民意调查从侧面印证了国家仪式在培育库尔德民众的国家认同方面成效低微。在 2007 年

①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6 页。

② 曾楠:《国家认同的挑战与建构:基于国家仪式的视角》,载《思想理论教育》2022 年第 11 期,第 56-62 页。

③ Eli Amarilyo, “History, Memory and Commemoration: The Iraqi Revolution of 1920 and the Process of Nation Building in Iraq,”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51, No. 1, 2015, pp. 72-92.

④ 韩志斌:《民族主义建构中的历史认同——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的个案考察》,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6 期,第 158-162 页。

⑤ Tunahan Yıldız and Zana Çitak, “The Multiple identities of the Middle East: a case of Iraqi Turkmen refugees in Turkey,” *Journal of Balkan and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23, No. 2, 2021, pp. 339-357.

一项针对库尔德大学生的调查显示,高达 76% 的大学生认为自己不是伊拉克人,90% 的大学生支持库尔德人独立建国。^① 还有一些部落民认为在伊拉克当下环境中,有比开展仪式活动更重要的事情。一位民众表示,“我来自基尔库克,那里有巨大需求,我们与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关系紧张,我们有人挨饿,我们有没上学的孩子……我们需要卫生、安全和工作,我们不需要重建旧尖塔,遗产不是我们的优先事项”^②。

其次,伊拉克试图通过集体记忆来培育部落民国家认同。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③,其提供的事实、符号、情感等能为建构国家认同奠定基础。伊拉克官方曾使用两类集体记忆培育部落民的国家认同。

一类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历史荣光记忆。1968 年复兴党上台后,政府开始在考古发掘、公共建筑、文化艺术、思想观念等领域全面复兴美索不达米亚遗产。以考古为例,政府加大拨款进行遗址修复并重建了哈特拉、尼尼微等遗址,同时加强文物保护和立法、成立“国家文物和遗产部”、在世界范围内发起追回流落在外的伊拉克文物的国际行动等。^④ 伊拉克试图通过激活历史荣光记忆,来重塑伊拉克独特性,从而激发部落民对拥有伊拉克人身份即两河文明继承人的自豪感。在这种记忆叙事下,一些部落如沙马尔、蒙塔菲克等,在文化建构上将这一文明遗产视为部落土地荣耀,在其话语宣传中经常出现“保卫祖先的土地”“古代英雄的后裔”等表述。但在库尔德部落民看来,这种官方打造的记忆强调的是伊拉克人为苏美尔(Sumerian)、巴比伦(Babylonian)、亚述(Assyrian)和阿拉伯民族的直系后裔,其背后隐藏着伊政府将美索不达米亚历史的所有时期阿拉伯化的意图^⑤。库尔德人自认为本民族的起源可追溯至米底人(Medes)、库尔提人(Qourties)和其他扎格罗西亚古代群体,但在伊历史教科书中却将这些群体描述

① 唐志超:《中东库尔德民族问题透视》,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81 页。

② Benjamin Isakhan and Lynn Meskell, “UNESCO’s project to ‘Revive the Spirit of Mosul’: Iraqi and Syrian opinion on heritage reconstruction after the Islamic Stat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Vol. 25, No. 11, 2019, pp. 1189–1204.

③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8 页。

④ 艾仁贵:《从文明遗产中寻求国家认同:考古发掘与中东民族国家构建》,载《西亚非洲》2023 年第 5 期,第 22–49+157 页。

⑤ Sargon Donabed, “Rethinking Nationalism and an Appellative Conundrum: Historiography and Politics in Iraq,” *National Identities*, Vol. 14, No. 4, 2012, pp. 407–431.

为入侵者、野蛮人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破坏者,这让其无法接受。正如库尔德部落酋长巴尔赞吉所强调,“库尔德人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库尔德斯坦南部从未成为美索不达米亚的一部分”^①。

另一类是伊拉克近代因殖民统治、内部分裂、战争频发所带来的灾难性创伤记忆。政府试图通过唤醒这些记忆,使部落民意识到国家认同缺失将会让所有伊拉克人成为“受害者”。部落社会对此进行了回应。在伊拉克人尤其是什叶派部落群体的认知中,1920 年起义始终承载着对抗一切外国占领的意义。正如 2006 年某次采访中,正如一位 1920 年起义的部落领导人的孙辈哈里斯(Harith)博士所声称,“2004 年费卢杰反美活动得到了全体人民的支持,当时外来势力企图控制伊拉克资源并压制阿拉伯与伊斯兰身份认同,但这场斗争最终重现了 1920 年革命时伊拉克人民团结一致对抗外国占领的光荣历史”。^②

最后,伊拉克试图通过符号体系来培育部落民国家认同。符号能使语义上“国家认同”承载于形象化的象征系统以传情达意。伊拉克分两步来实践。第一步是建构文化符号与政治符号于一体的国家符号体系。以 2004 年伊拉克设计的一款邮票为例,邮票上不仅印有身穿库尔德服饰的妇女、戴着黑色头巾划船的什叶派妇女、逊尼派孩童等部落文化符号,而且印有统一的伊拉克地图、国旗、政治标语等政治符号,旨在将软性感召与硬性规约相结合来形塑认同。^③ 第二步是推进国家符号体系对部落民传播渗透。一是借助教育渠道。君主制时期,伊拉克政府曾吸引部落子弟到世俗学校接受现代教育。萨达姆时期,政府鼓励在历史教科书编写和学术研究中将伊拉克古代文明阿拉伯化。二是借助大众传媒。20 世纪 20 年代全国性报刊媒体以伊拉克领土国家这一政治符号为重要面向,向民众灌输日常“伊拉克特性”意识^④;萨达姆曾默许媒体将其描述为“新的萨拉丁”^⑤。三是借助公共空间与象征载体。萨达姆时期,与其相关的元素大量出现

① Aram Rifaat, “The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Kurdish Nationhood Project in Modern Iraq,”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52, No. 3, 2016, pp. 488–504.

② Eli Amariljo, “History, Memory and Commemoration: The Iraqi Revolution of 1920 and the Process of Nation Building in Iraq,” pp. 72–92.

③ Noga Efrati, “Postage Stamp Iconography in Post-Saddam Iraq: Sect-specific Symbols or Nationalist Imagery?,” pp. 958–976.

④ Johan Franzen, “The Problem of Iraqi Nationalism,” *National Identities*, Vol. 13, No. 3, 2011, pp. 217–234.

⑤ Matthias Determann, “The Crusades in Arab School Textbooks,” *Islam and Christian-Muslim Relations*, Vol. 19, No. 2, 2008, pp. 199–214.

在国旗、货币、邮票等官方载体中。

总的来说,建构和传播的国家符号体系,在部分民众中已培育出超越部落的国家认同。伊拉克战争后,当无数盗匪从伊拉克国家图书档案馆偷走稀有的伊斯兰史料文本时,身为伊国家图书暨档案馆馆长的萨德·伊斯康德(Saad Eskander)在工作日记中痛心写道,“在黑暗、仇恨及狂热等情绪的蛮横肆虐下,……数以万计的纸张飘扬在空中,犹如天空降下书本、泪水及血滴”,随后他在接受《华盛顿邮报国际版》采访时表示,“不管你是库尔德人或逊尼派或什叶派,我们彼此之间唯一共有的,就是国家图书馆。这是我们国家意识之所在”。^①然而,也有一些部落虽然接受了国家符号,但其行为动机多出于部落生存利益考量,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乌鲁克遗址是伊拉克的象征符号,属于贝都因·图贝(Bedouin at-Tobe)部落管辖,但要让部落首领穆哈尔·鲁曼(Muhhar Romain)带领成员保护这一遗址,前提是相关考古文物机构要向其支付保护资金,一旦资金停止发放,部落受限于生存条件便对保护遗址无能为力。^②此外,还有一些部落群体对特定国家符号持抵制态度。在2004年新成立的伊临时政府作出决定保留现行国旗(萨达姆时期国旗)时,库尔德人曾愤怒地在领土上升起库尔德旗帜,他们认为伊拉克国旗与实施暴行的萨达姆政权有关联。^③

综上,伊拉克官方解决部落问题的探索始终游走于部落传统惯性与国家整合需求之间,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暂缓了部落传统与国家建构间的现实矛盾,但却始终无法彻底根治部落问题。

五、结语

伊拉克国家建构中的部落问题,是一部交织着历史积弊、外部干预与内部博弈的复杂叙事。一方面,部落如一条坚韧纽带,维系着伊拉克社会根基,在播撒民族主义“火种”、巩固政权统治、维护社会秩序、响应国家号召同外敌作战等方面对国家建构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另一方面,部落也为国家建构带来消极影

① [伊拉克]萨德·伊斯康德:《烽火守书人:伊拉克国家图书馆馆长日记》,李静瑶、张桂越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63-64页。

② Joris D. Kila, “Cultural Property Protection in the Context of Military Operations: The Case of Uruk, Iraq,”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Archaeological Sites*, Vol. 13, No. 4, 2011, pp. 311-333.

③ Elie Podeh, “From Indifference to Obsession: The Role of National State Celebrations in Iraq, 1921-2003,”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37, No. 2, 2010, pp. 179-206.

响,不断在权力逻辑、秩序供给、安全保障、认同基础方面撕裂着国家建构,使伊拉克在国家权力体系整合、法理权威确立、安全协同、国家认同培育等领域屡屡受挫,甚至可能陷入部落侵蚀国家或国家强力压制部落的恶性循环。

处理好部落与国家间关系,对伊拉克的国家建构至关重要。在伊拉克国家建构进程中,伊拉克政府曾试图采取机制整合、根基消解、认同重构三种策略来解决部落问题。但从实践看来,这些尝试虽然在特定阶段和局部缓解了部落同国家间的矛盾冲突,但却始终无法彻底根治部落问题。究其原因,这些尝试一方面受限于来自部落社会的权威替代性、利益分散性、组织松散性、认同排他性等部落本质属性同国家建构间的深层张力,另一方面受限于来自伊拉克包括殖民遗产下的族群裂痕、权威更迭的信任创伤、种族宗派的严重对立、极端主义的肆意蔓延、外部干预的持续扰动等诸多因素。可见,在伊拉克国家建构过程中,平衡部落与国家间关系的任务十分艰巨。部落问题的本质是传统社会结构与现代国家治理逻辑间的兼容难题。未来部落问题的根本解决,关键在于伊拉克能否在承认部落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历史与现实基础上,探索出一条既真正尊重部落文化,又能以公平的资源分配、包容性政治参与、稳定的安全保障等长效机制为支撑,同时借助经济发展、社会融合、仪式记忆符号等培育超越部落的国家认同的路径。尽管这一过程注定漫长且充满挑战,但这不仅是伊拉克国家建构的核心命题和长远使命,而且其经验教训也为其他从传统部落社会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中东国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比较实践样本。

(责任编辑:包澄章 责任校对:章 远)